

多角戏

吴山恨事
浣纱传奇
精神战士陆游
从松雪斋到鸥波亭
股市高手胡光墉
柳亚子的牢骚
南塘河志



贰臣 赵孟頫

间谍 西 施 总督 阮 元

名士 柳亚子 逸客 王羲之 巨商 胡光墉

诗人 陆 游 权相 伍子胥 歌伎 苏小小 隐士 张志和

学者 叶 适 俗吏 郭 界 艺人 黄昇庵

柯 平 著
万卷山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

多角戏

柯
平
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柯平 201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多角戏 / 柯平著. —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

2019.5

ISBN 978-7-5470-5140-5

I. ①多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国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54973号

出 品 人: 刘一秀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6mm × 210mm

字 数: 220千字

印 张: 10.5

出版时间: 2019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新楠

装帧设计: 张 莹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ISBN 978-7-5470-5140-5

定 价: 48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31255233

自序

多角与独角

柯 平

在文学与历史之间荷载彷徨，踽踽独行，时间一长，涉览渐深，感觉二者之间的界线实在模糊得很。如白居易《余杭形胜》的开头两句“余杭形胜四方无，州傍青山县枕湖”，要比杭州著名的南宋三志更像是历史，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“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刘媪。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”，相信会让网上最著名的玄幻小说家都感觉自叹弗如。

由此激发的好奇心或窥私癖，可谓特殊的精神能量，伴我度过了中年的大部分时光，它或许相当奇妙，但更可能十分糟糕。如果从出版《阴阳脸》那时算起，到现在已有十五年，每天最爱扮演的角色是断案的老吏或社区的警察，连微信也不

用，只热衷于跟各种各样的古人打交道，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的言谈、服饰、饮食，包括时空观念甚至出行工具，目的就为弄清向往中的历史真相，但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糊涂。其中一半时间用在对运河的研究，写成《运河个人史》三卷六十万字，却因清华简、上博简和韩国《燕行录全集》的陆续问世，变得毫无自信，不敢拿出来出版。另一半献给了本省的地方志，尤其我喜欢的杭州，写了不少有关当地古代人物的文章，但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，基本没说什么好话，或者说，私见大于正史，质疑多过肯定，今结入此集的《吴山恨事》《苏小小考》等，可略见其一斑。

说到人物，或许有必要解释一下书名的意思。将人生比作戏台尽管是用烂了的比喻，但此书修订完成后，面对书里这些身份不同、姿态各异的人物，还是不由自主想到了它。好在这个舞台甚为宽阔广大，剧情自觉也略有新意，时间背景方面从春秋的伍子胥到民国的黄异庵，更有整整两千五百年，也足够长的了。至于轮番上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男女，尽一生努力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只记得鲁迅曾经说过：“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，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。”以此而论，看头应该还是有一点的，就不知风格是否对观众的胃口了。

感谢万卷出版公司的刘一秀先生，从最初闻知我对运河有兴趣到现在，一直关心着我的创作情况，并以极大的耐心容忍我的懒散和拖延，直到感觉自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再不有所作为，只好请出九位新主角和四位旧主角凑成这么一台戏。尽

管如此，从口头答应到签约到交出书稿，也已经两年过去了。还有远在东北的诗人兼批评家宗仁发先生，几年前他在刊物上看到我的《吴山档案》（《吴山恨事》原名），曾写文章予以肯定，尤其文中有关“潘侯”的见解相当高明，触及吴越历史的软肋或实质部分，终因与正史抵触太大，尽管颇受启发，在修改时也没敢深入探讨下去。附于卷末，算是给自己这种不无离经叛道之嫌的写作方向增添一点信心。

二〇一九年春节 湖州

目 录

权相 伍子胥

吴山恨事 / 001

间谍 西施

浣纱传奇 / 034

逸客 王羲之

金庭隐事 / 055

歌伎 苏小小

苏小小考 / 070

隐士 张志和

西塞山本事 / 096

诗人 陆游

精神战士陆游 / 110

学者 叶适

南塘河志 / 130

贰臣 赵孟頫

从松雪斋到鸥波亭 / 173

俗吏 郭昇

《客杭日记》始末 / 219

总督 阮元

滇池的文化背影 / 243

巨商 胡光墉

股市高手胡光墉 / 261

名士 柳亚子

柳亚子的牢骚 / 270

艺人 黄异庵

江南花落李龟年 / 292

附录

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重要吗 / 323

[权相]伍子胥

吴山恨事

上 篇

在古代杭州市区东北，有一片迤逦起伏的带形丘陵，名字虽冠之以山，实际上是江中的洲岛，上面有许多玲珑的小丘峰，所谓的吴山，不过是其中之一峰罢了，而且还不是最高的。但它在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分量，却怎么形容也不过分。市民们习惯将它看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在地方史学者眼里，更视之为当地文化最古老的源头。因山下有一座著名的寺庙，庙额随时代而变，种种不一，民间俗称青山庙或神庙，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贤臣伍员。这个名字对于国家的历史是什么概念，想必不用解释也知道。地以人荣，山因名高，志士仁人千年不灭的精魂，自然连山上的一草一木也都跟着沾光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北宋时两度出任地方行政长官的苏轼，还专门为它写了首广告诗，叫作“朝见吴山横，暮见吴山纵。吴山故多态，转侧为君容”，从旅游角度做了很好的推介，相比两位

唐朝前任严维和张祜，一个称“一径入湖心”，一个称“西湖石岸头”，诗艺上也是不遑多让。而后来金主完颜亮为江南花花世界所迷，兴师伐宋，行前以“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”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，应该说也是很有眼力的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十四回讲马二先生在吴山顶上看杭州：

“那日江上无风，水平如镜，过江的船，船上有轿子，都看得明白。再走上些，右边又看得见西湖，雷峰一带、湖心亭都望见，那西湖里打鱼船，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。……一边是江，一边是湖，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，又遥见隔江的山，高高低低，忽隐忽现。马二先生叹道：真乃载华岳而下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”这段文字写得实在漂亮，既体现通俗小说的语言水平，也表明自己观赏的位置。虽说昔欧阳修《有美堂记》“邑屋华丽，盖十余万家。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。而闽商海贾，风帆浪舶，出入于江涛浩渺、烟云杳霭之间”的描写也不差，难怪会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，但就生动传神而言不如前者。可惜忘了把这位伍英雄给带上一句，不然的话就更完美了。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，清代有个叫金志章的，还专门修纂了一部《吴山伍公庙志》，让后人知道这座山的精神脉络是什么，以及如何形成。但今天的旅游者如果在河坊街上玩腻了，顿起怀古幽思，打算爬上旁边的吴山效法前人，恐怕要使用大功率的军事望远镜才行。

伍公即伍员，清华简作五子正，俗称伍子胥，是古代吴国宰相，春秋贤臣，这在今天固然已是常识，但吴山原名胥山，又名青山，就不是一般人所知晓的了。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之一

《淳祐临安志》在交代它的来历，老老实实引了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“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上，因命曰胥山”这段源头性记录。后来《咸淳临安志》内容虽然丰富，只是史料方面的堆砌而已，比如改写了《淳祐临安志》的内容，增补唐宋间几位太守的碑记及相关诗词。至于庙是哪个年代开始建立的；吴越两国当初为敌国，子胥的精神依恋之地何以不在彼而在此；姑苏有庙，却有名无实，钱塘越地，却虔诚祭祀敌方主帅，是否具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合理性；尤其是庙的位置，《史记》明确说是在江上，后来为什么却矗立山顶？对这些问题，基本都做了回避。事实上从古代保留下来的文献看，无论唐卢元辅《胥山铭记》“求忠者之尸，祷水星之舍”的描写，还是南宋赵与懽《英卫阁记》“冠山椒而特立，镇江涛而不惊”的形容，地望方面所透露的信息，跟《史记》里的记录是一脉相承的。包括当地数量多得可以把整座山都覆盖的文人诗词，也让人感觉原址只能在水上江侧，否则的话就不好理解了。如白居易诗称“涛声夜入伍员庙，柳色春藏苏小家”，李绅诗称“伍相庙中多白浪，越王台畔少晴烟”，蔡襄诗称“潮头正对伍员庙，燕子争归百姓家”，强至诗称“江上胥山古木阴，祠堂气象亦萧森”。这几位都是唐宋时的杭州太守，有的还出生本土，最有发言权的。看了这些状物如在目前的生动描写，如果谁还认为现在杭州吴山上的那座是原汁原味，只能说明自己的感官系统有问题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古怪，里头到底藏了什么猫腻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，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源头，即此庙神主伍氏临终前的相关情况。据最早记录此人生平的《越绝

书》披露，身为吴国宰相的伍子胥跟吴王夫差的矛盾，始于周敬王二十六年（前494，夫差三年，勾践四年），因对战败国越国的处置意见不合而起。伍子胥主张坚决不能宽恕，必须从肉体到精神（祭坛，时以此为国家存在标志）予以彻底消灭，留着早晚是个祸根。理由是两国国土相连、习俗相同，任何一方的强大，必以另一方的弱小为代价，说白了就是有我无你，有你无我。而夫差显然缺乏这样的政治远见，加上虚荣心又强，对敌国君臣匍匐于自己脚边甘为奴仆的场景有相当兴趣，加上另一大臣太宰嚭私下收受了越方贿赂，极力为之说情，最后还是决定以附庸国的形式让对方继续存在。这样的结果，显然为以前朝元老兼功臣自命的伍子胥所无法容忍。另一汉代文献《吴越春秋》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：“伍胥在旁，目若燿火，声如雷霆，乃进曰：‘夫飞鸟在青云之上，尚欲缴微矢以射之，岂况近卧于华池，集于庭庑乎？今越王……入吾桎梏，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，岂可失之乎？’”而夫差为自己的优柔寡断，最终养虎成患寻找的理由是：“吾闻诛降杀服，祸及三世。吾非爱越而不杀也，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。”于是，“夫差遂不诛越王，令驾车养马，秘于宫室之中”。（引文同上）

接下去的十年，为两人君臣关系的不断交恶期，且每况愈下。在伍子胥一方，看着君主被敌方利用，国家一天天走下坡路，而吴王本人居然还蒙在鼓里，心里一着急，说话自然也就没什么顾忌，有时甚至还会暴跳如雷、破口大骂。在夫差一方，一个所谓的“老革命”，居功自傲，整天在耳边啰里巴唆，对自己做出的任何国策都要反对，而且说出来的话又是那

么恶毒，开口闭口就是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早晚全得死定”或“臣必见越之破吴，豸鹿游于姑胥之台，荆榛蔓于宫阙”。开始念他是先王功臣，不免还让着几分，到后来可是越来越无法忍受了。夫差十三年伐齐归来当为两人的最后摊牌时间。由于行前伍子胥持极力反对态度，并断言出师必定不利，因此夫差得胜回来后趾高气扬，一见面就指责他“昏耄而不自安，生变起诈，怨恶而出，出则罪吾士众，乱吾法度，欲以妖孽挫衄吾师”。没想到姓伍的尽管预言失灵，却丝毫不肯退缩，反口相衅，说这样下去国家的灭亡是迟早的事，并让夫差赶紧把他杀了，“员诚前死，挂吾目于门，以观吴国之丧”。（详见《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》）

春秋历史上最著名的这一悲剧，因双方个性的倔强，就这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。伍员死后头悬国门的记载，听起来像是段子，有着一定的传奇色彩，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号称是信史，书里非但也这么说，甚至还具体说明首级的悬挂地点是在都城的东门之上，那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。都城即吴国国都，从前叫姑苏，现在叫苏州，而东门一名蛇门，文化上的含义应该与吴地信奉巫术的传统有关。“曰蛇门者，为其于十二位在巳也；又云：以越在巳地，为木蛇北向，示越属吴也。”（见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》）其门至今尚存，不过已改称盘门，好像是从范石湖编《吴郡志》的时候开始的，并没说明是什么理由。从地理方位看，当为都城的正东偏南，算是基本满足了死者生前提出的要求。当然挂在那里的只是脑袋，而剩下的那个无头尸身，则被盛进一个叫鸱夷的物事扔到了江里。这玩意儿

据东汉写《风俗通义》的应劭说，材料采用皮革缝制而成，模样像个大酒壶，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，如同现代的橡皮艇一般。当然，由于整体采用密封状态，你也不妨称它为超级气球。

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，想象当年发生的这悲剧性的一幕，确实让人唏嘘不已。伍子胥这个人，毫无疑问是位爱国主义典范，同时也是个性有缺陷的人，比如狂傲、自负、任性，典型的炮筒子脾气，心里有话根本藏不住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从前面与吴王的几次争吵就看得出来。行事更是凭一己之好恶，毫无原则和底线可言，当年奔吴途中好心帮助过他，于他有恩的渔父和浣妇，即先后因此而死。而阖闾九年（前506）率吴师攻入楚国，将仇人平王的尸体从坟里挖出来鞭打出气倒也罢了，最难让人接受的是，竟然会“令阖闾妻昭王夫人，伍胥、孙武、白喜亦妻子常、司马成之妻，以辱楚之君臣也”。这里所谓的妻，是古人的玩法，跟现代汉语有别，指的当然就是强奸了。这样对待战俘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，那是比后来的日本鬼子都要厉害了。对此他自己居然还有个解释，叫作“吾日暮途穷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”。但这样一位吴国历史上拓土开疆、功勋盖世的大英雄，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忧思，不断地进谏，说了些吴王不爱听的话，到头来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也实在出人意料。后世的同情与缅怀，大概主要也是冲着这一点。因此，如果要评选春秋战国版的“感动中国”十大人物，此人不仅肯定可以入选，而且名次起码能进入前三。

或许，对于本文要讨论的主题，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在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“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

上，因命曰胥山”这段话后面，有唐人张守义《史记正义》的一段注解，而这段文字，亦非出自原创，又是从比他还要早四百年的晋代学者顾夷《吴地记》（原书已佚）里引来的：“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，又向下三里，临江北岸立坛，杀白马祭子胥，杯动酒尽，后因立庙于此江上。今其侧有浦名上坛浦。”它告诉我们，历史上真实的伍公庙，至少是最早的祭奠场所，地望肯定应该是在江边一个洲岛上，后来改作了庙，地名胥山，既不可能离江太远，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是在有近百米高度的山上。除非你把司马迁打倒，把《吴地记》和《史记正义》推翻，否则这历史想要改变是相当困难的。

前面说的有关伍公庙的两个关键问题，现在有一个看来已经基本解决，剩下的就是具体位置在哪里了。三江口的地望要落实不难，因上述顾夷《吴地记》里另有一条资料，称“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并松江为三江”。也就是说，这地方以苏州计是东南三十里，以吴江计是东北七十里，两条直线交叉的那一点，应该就是当年伍公祠或伍公庙的位置了。再向下三里的江北岸，即为祭台所在。这个地方，实际上也就是《吴越春秋》里说的“三津”或“三道之翟水”。该书卷七记勾践因主动吃了夫差大便，令对方深为感动，因获提前释放，行前他辞别吴王：“再拜跪伏，吴王乃引越王登车，范蠡执御，遂去。至三津之上，仰天叹曰：嗟乎！孤之屯厄，谁念复生渡此津也！”又该书卷十记后来越国强大后复仇伐吴，攻破檇李后一路上打过去，“大败之于囿，又败之于郊，又败之于津（即三津），如是三战三北，

径至吴，围吴于西城”。因伍子胥冤魂作怪，只允许越人从东门进入，因为他的头颅悬挂在那里，要等着看好戏。“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，入海阳，于三道之翟水，乃穿东南隅以达，越军遂围吴。”

吴地伍子胥庙的原始位置弄清楚了，另一头越地的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面的秘密，应该就在连接两地的那条东江上了。此江实为浙江别名，出钱塘后北行连接松江，是春秋时吴越两国的主要航道。从现存文献看，伍子胥的神祇及相关传说盛行于钱塘山阴，最早应该是它的功劳。王充在所著《论衡》里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他说“传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，煮之于镬，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。子胥恚恨，驱水为涛，以溺杀人。今时会稽丹徒大江、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，盖欲慰其恨心，止其猛涛也”。这一记录清楚表明，杭州的伍相祠或称伍公庙，至少在他生活的东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。尽管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，他对当时席卷整个江南的这场民间的信仰狂欢基本持否定态度，认为“夫言吴王杀子胥，投之于江，实也。言其恨恚，驱水为涛者，虚也”。但不管是怀疑还是反对，庙已在越国地面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而《越绝书》又有“朝夕既有时，动作若惊骇，声音若雷霆”的形容，《钱塘记》又有“朝暮再来，其声震怒，雷奔电走百余里。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，因立庙以祀焉”的记录，可见伍氏的神灵和著名的浙江潮，犹如一个天然的精神结合物，彼此密不可分，后来吴地的庙反不见提起，希望不是潮水太大被冲没了的缘故。

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有关会稽的概念，这一地名来自伟

大的夏禹，为他老人家当初治水会江南诸侯之所。最初只是山名，秦王政二十五年（前222），秦将王翦“定荆江南地，降越君，置会稽郡”，才正式成为郡名，而正史告诉我们郡治所在地是在苏州，也让人有点难以理解。然后又有东汉永建四年（129）的所谓拆郡之事，即分原会稽郡为二，以浙江为界，江南为会稽郡，江北为吴郡。这样看来，既然以江为界，庙又在江心岛上，说本来就是两地共享也未尝不可。后来泥沙淤结，江道变窄，洲岛逐渐与江南侧连接，才开始完全为越地所有。具体年月方面，以南宋地理学家程大昌的考证，大约为唐中宗景龙年间，他的观点是“州图经（《祥符杭州图经》，成于北宋，亡于南宋）云：塘（沙河塘，即湖中沙堤）在县南五里，此时河流去青山未甚远，故李绅诗曰：犹瞻伍相青山庙。又曰：伍相庙前多白浪也。景龙沙涨之后至于钱氏，随沙移岸，渐至铁幢。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，皆为通衢，居民甚众，此图经之言也”。（见《演繁露》续集卷四）就是说从公元八世纪初开始的地理演变即所谓沙涨，至五代钱镠兴起时而告结束，持续了差不多有百年之久，作为句号的就是于昔日江湖之上筑起来的吴越新城。而杭州究竟属吴属越，《淳祐临安志》说属吴，《咸淳临安志》说属越，还各有详细考证文章，煞是好看。其实个中秘密早由唐释处默的诗“到江吴地尽，隔岸越山多”泄露，还费那么多劲干什么？

而南岸越王城山下的古余暨县（今萧山）自然属于越地无疑，《汉书地理志》称“萧山，潘水所出。东入海”，《吴越春秋》又说“越王葬种（越大夫文种）于国之西山。葬一年